

如何喚醒沉睡中的語言？ 希伯來語復振的經驗*

張學謙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希伯來語沉睡近兩千年，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間被喚醒，重新獲得活力，成為廣為引述的語言復振成功的例子。其經驗常被描述為「語言死而復生」的「奇蹟」，或是「唯一的」語言復活實例。本文從語言習得和微觀語言規劃的角度，探討希伯來語復振成功的因素及過程。首先，本文分析希伯來語復振背後的相關因素，並探討希伯來語復振的過程，接著討論語言習得及微觀語言規劃在希伯來語復振過程扮演的角色，最後提出希伯來語復振對台灣的啟示。

關鍵詞：希伯來語、語言復振、民族主義、微觀語言規劃、語言習得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計畫《從紐西蘭到臺灣的語言巢：語言復振模式的調適研究》(NSC 97-2410-H-143-006)的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兩位審稿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壹、前言

聖經的巴別塔故事說道，人類想跟上帝爭個高下，建立巴別塔，作為人定勝天的標記，卻引起上帝的不滿，將人類的語言弄亂，造成語言多樣。希伯來語復振之初，由各地返鄉的移民，帶來各種不同的語言，構成巴勒斯坦地區的語言多樣性，有如崩塌的巴別塔。一百三十年前，希伯來語是沈睡中的語言（*sleeping language*），沒有人以之為母語，也不在日常生活，作為口語溝通之用。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沈睡將近兩千年的希伯來語，這時被喚醒，進行語言復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在短短的二十五年，成功的重建猶太民族的語言巴別塔。

希伯來語屬於亞非語系（*Afro-Asiatic language family*）閃米特語族（*Semitic languages*），大概在西元前十四世紀開始作為口語使用（*Zuckermann & Walsh, 2011*）。希伯來語流失和猶太歷史有密切的關係。希伯來語的極盛時期是在大衛王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來王朝（西元前 1006 年），西元前 587 年，猶太人第一次失去國家，猶太人成為「巴比倫之囚」，到了西元第二世紀，不再作為口語使用，其中，132-5 年的巴爾·科赫巴起義（*Bar-Kokhba Revolt*）失敗，可以作為希伯來語口語時代結束的象徵（*Zuckermann & Walsh, 2011*）。民族遷徙造成不同語言的接觸，猶太人不斷受到當地強勢語言的影響，先後使用過阿拉米語、希臘語和拉丁語（鐘志清，2010）。

十九世紀末，希伯來語復振運動展開之前，希伯來語已經沈睡近兩千年了。由於歷史的因素，希伯來語遭逢「由下而上的語言死亡」（*bottom up death*），也就是說，不再作為日常生活的口語溝通，但是仍用於儀式，正式場合，就像歐洲拉丁文、印度的梵文一般（*Nettle & Romaine, 2000*）。就此，說希伯來語是死而復生的例子，並不完全正確。如 *Cooper (1989: 12)* 指出，一種語言只要完全停止使用就已死亡，這條規律也適用於希伯來語。希伯來語的「復活」指的是，重新成為本地語，作為日常口語的溝通之用。

希伯來語復振常被引為「語言復活」(language revival)的例子。Paulston et. al. (1993: 236) 甚至說希伯來語是「唯一語言復活的真實例子」，此外，還有人形容希伯來語復振為「史無前例的社會語言現象」，甚至稱之為「奇蹟」(Nahir, 1988)。另外，Fishman (1991) 使用「再本土話」(revernacularisation) 強調希伯來語，從一個古典的文學神聖的語言轉變為日常口語使用。本文採用 Spolsky (1991) 「語言復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 的術語，以強調希伯來語並非完全死亡，其復振過程主要涉及在書面語言的基礎下，增加口語功能，並達成族語的世代傳承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¹

台灣族群語言，除了華語外，都有流失的現象。1980年代中期，學者的調查就發現臺灣各族群都有母語移位至華語的現象，後續的研究也都顯示台灣族群語言流失，轉用華語的現象(張學謙，2011a)。如何復振台灣母語使之重獲活力是目前台灣重大的社會語言議題。希伯來語復振在短短的二十五年完成，這對母語長期流失的台灣族群是很大的鼓舞。語言復振並非在真空中產生，到底，希伯來語復振涉及哪些因素、復振的過程又是如何？希伯來語復振對台灣又有何啟示？這是本文擬探討的三個問題。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進行相關資料的研讀與分析，主要參考兩方面的文獻：(一)希伯來語語言復振的相關研究，以探討希伯來語復振的相關社會、歷史、政治背景及其發展；(二)語言習得、語言復振及語言規劃理論，由於希伯來語復振之初，以色列尚未建國，本文借重微觀語言規劃(micro language planning)的觀點，嘗試解釋希伯來語復振成功的原因。

前言之後，第二節討論希伯來語復振的社會語言因素；第三節描述希伯來語復振的過程；第四節從微觀語言規劃分析希伯來語復振；第五節討論希伯來語復振對台灣的啟示；第六節為結論與建議。

¹ 語言復振是語言政策的一種，規劃者透過政策(policy)，嘗試改變他人的語言實踐(practice)或是意識形態(Spolsky & Shohamy, 1999)。

貳、希伯來語復振的社會語言因素

語言規劃活動並非在真空中做成，而是在一定的社會語言情境下進行，因而語言規劃需要連接社會因素加以探討。Cooper (1989: 93-98) 則提醒研究者注意社會變遷與語言規劃之間緊密的互動關係，他提出五個需要關注的社會面向，包括：情境、結構、文化、環境和資訊面向。語言復振為語言規劃的一部份，語言復振的研究，同樣需要考慮社會語言狀況。希伯來語復振的研究向來注重社會語言因素的考量，如 Nahir (1983; 1988; 1998)、Fishman (1991)、Cooper (1989)、Spolsky (1991)。以下，參考相關研究將相關社會語言因素歸納為以下三項：一、多語言現象及共通語需求；二、猶太人獨立建國的意識形態；三、宗教及書面語傳統。

一、多語言現象及共通語需求

猶太人兩千年來散居世界各地，形成四個主要的猶太人社群(林書武，2001)：(1) 西歐(西班牙與葡萄牙除外)、美洲境內的猶太人；(2) 東歐、德國及前蘇聯境內的猶太人；(3) 西班牙與葡萄牙的猶太人；(4) 亞非地區的猶太人。流散在不同地區的猶太人大都具備多語言能力根據場合和目的選用不同語言，主要分為三種語言能力 (Spolsky & Shohamy, 1999: 10)：(1) 希伯來語為神聖的語言，作為宗教、學習和讀寫的語言；(2) 在猶太人社區使用猶太人的鄉土語；(3) 使用當地的語言跟外界打交道。

19 世紀中葉，來自不同地區的猶太人各自說著原居地的猶太社區語言，到二十世紀之交，社會上多語言現象仍舊，不同地區的移民，彼此之間仍然缺乏共通語。這個有如巴別塔時代 (Babel Generation) 的狀況，形成共通語的需求。阿摩司·奧茲以下的引文，描述當時語言不通的情形，並提出需要共通語的主張 (鐘志清，2010：124)：

120 年前，許多猶太人從歐洲來到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相遇，沒有一種共同語言。東方猶太人講拉迪諾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有時甚至講波斯語，但是不能講歐洲猶太人的語言；歐洲猶太人講

意第緒語、波蘭語、俄語、匈牙利語，有時講德語，但是不能講東方猶太人的語言。這兩大人羣是無法交流的。要進行交流，就必須有一種共同的語言，來做生意，來談話，進行買賣，即便他們當時講的是祈禱書中的希伯來語，但希伯來語作為東方猶太人與西方猶太人交流的語言，開始在日常生活中恢復了生命。

以上的引文提到，希伯來語作為猶太人的共通語，這種狀況應該不多見，因為復振之前的希伯來語，雖然並非完全死去的語言，但是很少用於口語溝通。猶太建國運動的創始人希歐多爾·赫茨爾（Theodore Herzl）在第一屆猶太建國主義會員大會提到，以希伯來語為共通語的困難（林書武，2001：31）：

應該說，我們想要有一種共同的通用語會有不少困難。我們互相之間無法用希伯來語交談。我們當中有誰掌握了足夠的希伯來語，能靠說這種語言去買一張火車票？這樣的事情是做不到的。

不過，和愛爾蘭比較，巴勒斯坦當時的語言多樣性，確實是個優勢，因為愛爾蘭長期使用英語，沒有**共通語**的問題，要以愛爾蘭語取代英語，需要克服強大的社會慣性，不容易完成；相對的，巴勒斯坦就較容易推行一個共通語，雖然這並不意味著共通語的選擇純然是溝通的考量。

語言復振之初，都會區語言最為多樣，應當是最有共通語需求的地方，按理說，應該是推行希伯來語最快速的地方，不過，實際上，都會區的希伯來語普及化，相當緩慢。1881 年來到巴勒斯坦的本-耶胡達（Eliezer Ben Yehuda, 1858-1922）是近代在家僅以希伯來語養育小孩的第一人，他到耶路撒冷 20 年後，也只有十戶人家在家說希伯來語（Cooper, 1989）。事實上，在一百年前，全世界會說意第緒語的猶太人將近一千萬人，卻沒有一個人以希伯來語為母語（Berdichevskv, 2004: 13）。當時從中東歐移民的猶太人，說的就是意第緒語。這些移民集中在移墾區，語言同質性相當高，無需希伯來語就能溝通無礙。有趣的是，現代希伯來語的開創者主要是以意第緒語為母語的中東歐移民。**在這些不缺共通語的移墾區，以意第緒語為母語的移民，展開現代希伯來語的復振運動，其希伯來語本土化**

(renativisation) 以及再本土話的推動，比語言多樣的都市地區更加有效率 (Spolsky, 1991)。溝通因素，並無法解釋在不缺共通語的農墾區，能夠率先達成希伯來語復振的理由。語言不僅作為溝通之用，還充當社會的階級標記以及族群的認同象徵。下節將從歷史的觀點，討論希伯來語復振背後的國家及社會政治因素。

二、猶太人獨立建國的意識形態

復振之初，巴勒斯坦是語言多樣的地區，形成共通語的需求。不過，語言溝通論並無法解釋，為何選擇一個沉睡近兩千年的希伯來語作為共通語。就母語人口而言，希伯來語一點也不通用，以之為共通語，顯然不是基於溝通的考量。從語言學習的角度來看，放棄常用的語言，改用其他語言，並不容易，因此，需要考慮其他非溝通的因素，特別是猶太人獨立建國的意識形態，在希伯來語復振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O’Laoire, 1996; Spolsky, 1996; Nahir, 1988)。

希伯來語的復振與猶太民族主義有關。十九世紀猶太復國運動興起，開始思考國語的問題，主要有多元國語以及單一國語這兩派。猶太建國運動的創始人希歐多爾·赫茨爾 (赫茨爾, 1993) 主張採用多元國語政策，他在《猶太國》一書中，他主張仿效瑞士的做法，讓多種語言共存。比較多支持者的是，盛行於十九世紀的語言民族主義的想法，主張「一個國家，一個語言」。到底是用哪一個語言作為國語，則有分歧，爭奪共通語地位的兩種主要語言為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

猶太建國運動和希伯來語復振運動緊密相關。猶太人於 1880 年代在東歐及巴勒斯坦展開希伯來語復興運動，就是受到歐洲的民族主義把民族語言與國家視為不可分割的一體影響 (Cooper, 1989)。19 世紀末，在猶太建國主義 (Zionism) 的號召下，流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開始移民至巴勒斯坦，掀起了幾次「阿利亞」(回歸巴勒斯坦的移民行動)。1880 年代俄皇被暗殺，一連串的鎮壓及屠殺，導致猶太人大量移出俄國，少數人來到當時為奧圖曼帝國所統治的巴勒斯坦。這些新移民當中，有不少年輕的知識份子，帶

來歐洲的民族主義，為接受希伯來語為國語打下意識形態的基礎。這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欣然接受希伯來語為共通語，不過，「老派」猶太人認為希伯來語是神聖的語言，拒絕將希伯來語用於世俗的功能（Cooper, 1989）。

領土和語言都是民族主義的重要元素，猶太人以巴勒斯坦作為建國的地方，以希伯來語為國語。猶太人推動希伯來語復振，為的是進行政治動員，建立自己的國家。有「希伯來語之父」稱號的本·耶胡達一開始傾向認為一個國家是否有其獨特的語言，並不重要，後來卻主張以祖先的語言、在祖先的土地，建立國家，他說（Saulson, 1978: 16-17）：

除非回到祖先的領土上，猶太人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同樣地，若非恢復祖先的語言，也無法建立自己的國家，祖先的語言，不僅使用於書面語、神聖或科學領域……還需要透過口語傳播，成為老幼、婦孺、男女老少、不分晝夜，使用於生活的種種事務，就像其他國家一般。

本·耶胡達在文中一直提到兩個民族主義的關鍵詞：領土和語言。由此可見，希伯來語復振和猶太建國主義的緊密關係。為了獨立建國，猶太人將希伯來語打造成「意識形態、歸屬、愛國情操、忠誠的象徵」（Shohamy, 2006: 170）。與歐洲民族主義將本土語言提升為高級讀寫文化不同，猶太人將書面語言擴充到日常口說的領域（Cooper, 1989）。

為何猶太人不將較為通用的意第緒語訂為民族共通語，而是採用缺乏母語使用者的希伯來語？這就必須考慮民族語言選用的歷史、政治和社會的因素。語言在民族主義運動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語言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為（Fishman, 1972: 44-45）：（1）語言提供民族運動與光榮的過去做連結；（2）語言連結民族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語言為民族的「靈魂」；（3）語言的區別及文學的獨特性，可以強化民族運動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獨立性。希伯來語在上述三項功能，都贏過意第緒語。猶太建國主義者把意第緒語視為過去的象徵，認為意第緒語讓人想起猶太人長期流散（diaspora）、遭受迫害、受苦受難的不幸歷史；意第緒語被視為「粗野不文」（vulgar）的語言，不適合科學和教育之用（Azaryahu, 1929；轉引自

Nahir, 1988: 279)；反之，希伯來語被視為猶太人的文學和民族語言，最能體現民族精神、歷史。對這些來自中、東歐的移民，講希伯來語可以「淡化猶太人在大流散期間的恥辱過去，有助於猶太人塑造一種新的身份。選擇希伯來語、摒棄意第緒語就等於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鐘志清, 2010: 124)。

意第緒語並非完全沒有支持者。其支持者認為有必要將日常使用的語言，提升為國家語言，打造本地語言使之成為國語，是歐洲民族主義國家常見的做法；相反的，希伯來語的支持者則訴諸民族大義，認為將希伯來語這個崇高的語言，推廣到日常生活，可以凸顯猶太民族的凝聚力(Spolsky, 1991)。1906年，意第緒語的支持者在Tshernovits會議，通過把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同列為國語(Shohamy, 2008)。不過，猶太復國主義和希伯來語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到後來，把語言和認同畫上等號，喊出「新的猶太人等於說希伯來語的人」的口號，希伯來語至此，已經成為新的認同的語言(Spolsky 1991)。第二次阿利亞移民(1904-14)，主要是來自中東歐說意第緒語的青年，對於轉向希伯來語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這些移民自視為先驅者以及國家的開創者，建立了基布茲(Kibbutzim, 集體農場)，規定在所有公開場合都說希伯來語(Harshav, 1993)。希伯來語成為共通語象徵著民族的「統一」，並表達民族的獨特性和認同標記。猶太人透過推動希伯來語，進行政治自主的動員，希伯來語成為追求社會變遷的工具，也只有在如此強烈的意識形態獻身下，才有可能克服溝通的不便，由意第緒語轉向希伯來語(Cooper, 1989)。在這個過程中，希伯來語也由原本的宗教語言成為政治語言。

希伯來語推動背後是排他性的語言民族主義意識形態。1913年的第十一屆的猶太建國主義者大會就提出將希伯來語作為猶太人的唯一國語。1913-1914年，海法工學院的「語言戰爭」，涉及到選擇德語或希伯來語作為教學語言的爭論，最後，希伯來語勝出，象徵性的確定希伯來語的霸權地位。Rabin(1973: 75)將這次的語言戰爭，視為現代猶太國存在的第一個語言證明。英國託管政府在1922年把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和英語定為官方語言，更加鞏固希伯來語的地位(鐘志清, 2010)。由希伯來語成為民族共通語的案例可知，語言並非純粹的溝通工具，意識形態的接受(ideological

acceptance) 在希伯來語復振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Spolsky, 1991)。

三、宗教及書面語傳統

文字化及讀寫實踐有助於語言復振。Colin Baker (翁燕珩譯, 2008) 提出族語書面語的三項重要功能：(1) 書面語提供超越時空限制的溝通手段；(2) 族語書面語提升族語的形象與地位，促進族語的傳播；(3) 書面語擴展語言功能，提供就業、社會流動的機會。猶太教及書面語傳統，對於希伯來語的傳播及保存有很大的幫助 (Spolsky, 1996; Cooper, 1989)，特別是在語言本體規劃 (corpus planning) 以及語言習得規劃 (acquisition planning) 這兩方面。簡單的說，希伯來語「起死回生」可以說是，從書面語擴展到包括口語的希伯來語使用，這也是希伯來語復振相當獨特的地方。

希伯來語復振之前，並沒有以之為母語的本族語人士，不過，猶太男性保有學習和使用希伯來語書面語的傳統。這就像是許多人能夠閱讀拉丁文或是古典漢文，不過，除了儀式外，沒有人在日常生活將這些古典語言當成口語使用。希伯來語在以色列人心中佔有特殊的地位。猶太人一般信奉猶太教，以《舊約》為聖經，希伯來語為聖經使用的語言，地位崇高 (林書武, 2001)。猶太律法要求男性參與每日禱告，研讀聖經及塔爾木德經 (Talmud) 以及數眾多的經文解釋 (Nahir, 1988)。平常的猶太男子，也要用學習希伯來語的書面語，以便閱讀相關的宗教文獻。宗教成為凝聚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的主要力量，由於共同使用希伯來語作為宗教語言，希伯來語也成為猶太人維繫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記 (鐘志清, 2010)。因此，希伯來語雖然長久未曾用於口語，卻在宗教領域方面，保留被動的語言技能 (receptive language skill)。² 要是是有足夠的動機和學習、使用的場合，這些被動的語言技能，有可能轉為主動的口語能力，對兒童的語言學習也有所幫助。

希伯來語書面語是希伯來語言復振的火種。在希伯來語口語失傳後，

² 語言四技是相互關聯，而非互相獨立。這些被動的語言技能，也有可能化為主動的口語能力。Glinert (1987) 認為在復振之前，已有半世俗性、稍帶日常口語功能的宗教性希伯來語存在。

猶太人仍然持續以希伯來語進行創作。這些豐富的書面語文獻，提供後續語言本體規劃的參考。³ Rabin (1973) 指出，希伯來語自西元 200 年不再用於日常交際，到以色列國成立（1948 年）為止，不僅用於宗教，還用於法律、科學、哲學及俗文學，期間出版的希伯來語書籍，有數萬種（引自 Cooper, 1989）。猶太人流散期間，希伯來語雖然不再做口語溝通之用，兩千年來，一直作為「活的書面語」（Nahir, 1988: 281）充當猶太人的「看得見」的共通語。希伯來語復振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具備「可以復興的語言」（a revivable language）（Nahir, 1988: 276）。

希伯來語書面語的推廣早於希伯來語口語的復振。18 世紀中後期，歐洲的猶太知識份子受到歐洲啓蒙運動的影響，率先在德國發起了猶太啓蒙運動（Haskalah），亦被稱為希伯來啓蒙運動（鐘志清，2010）。當時，推動希伯來語書面語的目的是為了建立融入現代文明社會，所需要的猶太世俗文化。猶太啓蒙思想家將希伯來語當成向猶太人傳播歐洲文化價值的手段，不過，啓蒙運動將原本主要用於宗教的神聖語言，用於文學和現代文明，也為後來希伯來語往下在日常生活紮根，做了預先的準備。非宗教的啓蒙運動及世俗的猶太民族主義同樣支持研習希伯來語及將之定為國語，當成猶太民族的象徵（Nahir, 1988）。本·耶胡達曾指出希伯來語復振的書面語優勢，他說：「我們，希伯來人，甚至比他們有優勢，因為我們有一門語言，我們可以用這門語言寫我們之所想，如果願意，我們甚至可以講這門語言」（自鐘志清，2010：123）。

希伯來語復振並非從零開始，而是從書面語出發，經過「再口語化」的過程，重新成為日常生活溝通的用語。下一節將討論，希伯來語如何從書面語出發，通過學校教育、校外擴展及世代傳承等過程，使得希伯來語再次成為日常用語。

³ 關於希伯來語的語言本體規劃請參考 Cooper (1989)。

叁、希伯來語復振的過程

語言復振涉及語言重新學習，因此可以從第二語言學習的理論，探討語言復振的過程。⁴ 族語復振需要達成語言的世代傳承，重新學習是第一個階段，族語被視為第二語言學習（learning），學會族語後，將族語以第一語言的方式，讓後代自然習得（acquisition）。以下整合 Spolsky（1991）第二語言學習理論以及 Nahir（1988）的希伯來語復振四大步驟，討論希伯來語言復振的過程。

一、Spolsky 的語言學習與語言復振理論

Spolsky（1991; 1996）從語言學習理論出發探討語言復振，認為語言的保存、易位（language shift）及傳播可以視為第二語言學習的特別個案。Spolsky（1989: 15）用以下的公式表示語言習得的相關因素及結果： $K_f = K_p + A + M + O$ 。⁵ 簡單的說，Spolsky 認為，語言學習取決於先前的知識、能力、動機以及學習機會（Spolsky, 1989; 1991; 1996）。據此，成功的語言復振需要作為教導者的成人對該語言有所瞭解，也要有適當的社會條件，讓兒童對該語言有積極的態度及語言學習的機會；為了達成語言的世代傳承，培養本族語人士，還需要鼓勵，新一代的母語使用者或學習者，跟下一代說母語（Spolsky, 1991; 1996）。

Spolsky（1991: 139）從社會由個人所組成出發，認為可以從個人的語言學習成敗，判斷社會語言使用。他說：

第二語言學習的研究常關注於個別的語言學習者，社會上的語言流失現象最後取決於個人組成的團體，有多少人學會該語言，有多少

⁴ 請比較 Spolsky（1991）。

⁵ 根據 Spolsky（1989: 15）： K_f 是語言習得將獲得的知識和技能； K_p 表示學習者現有的母語及其他語言的知識和技能； A 為能力的不同側面，包括生理、生物、智力、認知等方面的技能； M 為各種情感因素，如個性、態度、動機及焦慮等； O 為學習語言的機會，包括接觸語言的次數及性質，後者包括接觸正式或非正式的語言情境。

人不學以及多少人忘了該語言。因此，社會語言使用及知識的模式可說決定於個人語言學習的成敗。

語言學習並非在真空當中進行，語言學習的社會脈絡，從二方面影響語言學習：(一)決定學習的機會(正式或非正式)；(二)決定學習者態度和目標，形成其動機。成功的語言復振，就要求足夠的語言忠貞，謹守群體價值，以克服權力或經濟因素。有了母語學習動機，成功的語言復振還需要讓兒童有足夠的語言浸淫(immersion)，提供學習者「接觸」(exposure)、學習和使用語言的機會(Spolsky, 1991)。以下的分析將顯示，希伯來語復振符合Spolsky第二語言學習理論，同時，也將呈現，希伯來語由第二語言轉變為第一語言的過程。

二、Nahir 希伯來語復振的四步驟

Nahir (1988) 以「大躍進」(Great Leap) 來形容希伯來語從古典語言轉化為日常用語的過程，他認為希伯來語復振過程包括四個步驟(1988;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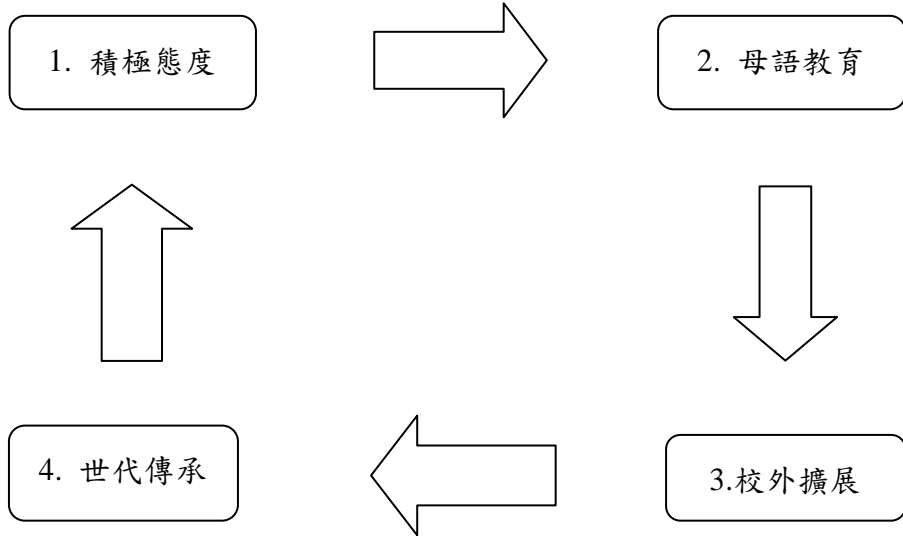
1. 培養兒童熱愛母語的態度和意識形態；
2. 接受母語教學，並學會母語；
3. 兒童學會作為第二語言的希伯來語，並將之擴展到校外；
4. 兒童長大成人後，娶妻生子，新生小孩以希伯來語為第一語言。

圖一是希伯來語復振過程的示意圖。以下，配合Spolsky (1991) 的語言學習理論以及語言復振理論，進一步討論希伯來語復振的過程。

(一) 積極態度：培養熱愛母語的態度和意識形態

Nahir (1988) 第一階段強調灌輸兒童支持母語復振，並對母語有正面的態度。這個階段涉及培養語言學習動機。Spolsky (1991) 認為語言復振取決於父母或其照顧者跟兒童說瀕危語言的決定。父母在選擇跟兒童交談的語言主要考慮到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及整合型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這兩者有所衝突時，需要足夠的意識形態力量，

克服工具性動機的吸引力。Fishman (1991) 的語言復振理論提到，語言復振之前需要進行語言意識澄清的工作，勸說進行語言復振的理由和必要性。



圖一：希伯來語語言復振示意圖（根據 Nahir, 1988；作者繪圖）

1880-1920 年代之間，以色列尚未建國，沒有國家單位推動，卻有猶太建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鼓勵家長自願將習慣使用的意第緒語轉為希伯來語，以便復興希伯來語，希伯來語是新的認同的語言 (Spolsky, 2009)。具強烈意識形態的家庭，不但在學校，也在家說希伯來語。Nahir (1988) 認為在缺乏政治權力的環境下，猶太移民者將語言視為能自我控制及民族的寄託，因此，全心全力的支持希伯來語。受到當時語言民族主義追求排他性的單語同化政策的影響，一方面，灌輸熱愛希伯來語的態度，另一方面，則醜化意第緒語，造成以犧牲意第緒語為代價，復振希伯來語。現在看來，這樣的犧牲並不需要，語言之間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學習第二語言不需要以母語為代價 (Cummins, 1979)。

（二）母語教育：接受母語教學並學會母語

對第二語言有正面積極的態度之外，還需要能接觸語言楷模，進行語言學習。學校母語教育提供 Spolsky (1991) 所說的語言學習機會。學校在希伯來語的復振扮演重要的角色。傳統歐洲猶太人以意第緒語進行希伯來或阿拉姆文字教學，1883 年本-耶胡達引進 Berlitz 的直接教學法，直接以希伯來語教希伯來語 (Spolsky, 1991)。1888 年爲了讓學生有足夠的語言學習環境，一些猶太學校仿效本-耶胡達的方法，使用希伯來語作爲教學語言。1892 年由 19 名教師組成的希伯來語教師協會決定，六歲的兒童進入小學就讀，在學五年中，全部以希伯來語進行教學，連聖經的解釋以及一般的研究，也都使用希伯來語，這在過去，都是以母語進行 (Spolsky, 1991)。將希伯來語作爲教學語言，不但有助於希伯來語的學習，也是希伯來語取得巴基斯坦共通語地位的關鍵 (Cooper, 1989)。

開設幼兒園是提供幼兒浸淫在希伯來語環境的主要手段 (Spolsky, 1991)。全希伯來語的教學，對不懂希伯來語的學生是極大的考驗。⁶ 爲了克服學生無法以全希伯來語上課的窘境。猶太人就以先修班的方式，在學前提供一至兩年的浸淫環境。幼稚園成爲發展希伯來語的主要工具。1894 年開辦希伯來語幼稚園給 4 和 5 歲的兒童就讀，小朋友以希伯來語爲日常用語，兒童學習語言快速，在全希伯來語的環境下，兒童很快的學會希伯來語，成爲家中成員希伯來語的模範 (Nahir, 1988)。這種狀況類似移民家庭，由兒童扮演家中的語言教導者。不過，在這個階段，家庭成員尚未能有效學習希伯來語，畢竟對家長以及兒童而言，希伯來語還比不上母語方便。

（三）校外擴展：學會希伯來語並將之擴展到校外

第三個步驟涉及到兒童把在學校學習的希伯來語帶到學校之外 (Nahir, 1988)。要在校外使用希伯來語並不簡單，因爲對這些兒童，希伯來語畢竟

⁶ 一般將浸淫式語言教育 (immersion education) 回溯到 1960 年代，加拿大的法語浸淫式教育，事實上，浸淫式教育的源頭應該是十九世紀末在巴勒斯坦進行的希伯來語教學。

是第二語言，不如第一語言（通常是意第緒語）來的方便。對父母或是其他成年人來說，也不容易，需要克服 Spolsky (1989: 162) 所說的語言選擇的「惰性條件」(inertia condition)，即一般人對同一人傾向繼續使用相同的語言。這就牽涉到先前提到的語言態度或意識形態的問題。在各個階段，語言態度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要突破「學校語言」的限制，需要強烈的語言意識，才能克服平常語言使用的習慣 (Spolsky, 1991)。這段期間，語言態度灌輸的重點，在於讓兒童體認到，使用意第緒語，雖然有立即的溝通方便性，但是希伯來語有更多的獎賞 (Nahir, 1988: 287)：(1) 希伯來語是社會上有聲望、有價值的語言；(2) 說希伯來語可以促進民族復興；相反的，說意第緒語則沒有這些政治、社會的好處。簡單的說，在語言態度灌輸上，仍然採取美化希伯來語，貶低意第緒語的方式進行。

希伯來語擴展到校外的使用，剛開始進度緩慢，1891 年的畢業生，畢業後，沒多久就停止說希伯來語；不過，十年後情況大有進展，根據 Spolsky (1991)，希伯來語已經成為「兒童的語言」(children's tongue)，雖然還不是「兒童的母語」。希伯來語走出學校之外，首先，形成由兒童構成的「希伯來語島嶼」(Nahir, 1988)。兒童之間彼此說希伯來語，然後，透過兒童的語言使用，影響家庭成員，這和一般由成年人傳播母語給兒童的方向相反，透過學校教育進行的語言傳播，常反其道而行，由兒童影響成年人的語言使用。學生因而成為連接家庭和學校語言使用的橋樑 (Nahir, 1988)。兒童學會希伯來語，將之帶回家使用，也激勵家庭成員使用希伯來語。有些媽媽就上夜校學習希伯來語，以便和小孩使用希伯來語交談，1905 年有一則報導提到，一個兩歲大的幼童，把學到的希伯來語教給父母 (Spolsky, 1991)。以色列人喜歡說希伯來語是唯一小孩教父母親的語言，這樣的主題常見於宣傳海報，圖二是一例。



圖二：鼓勵家長跟自己的小孩學習希伯來語的海報

資料來源：Berdichevsky (2004: 27)。

（四）世代傳承：新生小孩以希伯來語為第一語言

以希伯來語為第二語言的孩童，長大成人，結婚、生子，然後在全希伯來語的環境下，撫養小孩，社會上，開始有以希伯來語為第一語言的小孩。這時，希伯來語不僅是「兒童的語言」，正式成為「兒童的母語」，經過近兩千年的沉寂，大約在 1905 到 1915 年之間，開始有了從小僅說希伯來語的下一代 (Bachi, 1956)。1916 年的人口資料顯示，百分之四十的猶太人以希伯來語為「唯一或是第一語言」，在農墾區及特拉維夫的年輕人，更是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Census, 1918；轉引自 Nahir, 1988: 289)。

希伯來語復振，到這個階段才算是完成最重要的世代間的語言傳承。根據 Spolsky (1991) 的估計，整個希伯來語復振的過程，花了 20 至 25 年的時間。到此，原本的有小孩組成的「希伯來語島」已經變成「希伯來語家庭」，隨著英國委任政府，賦予希伯來語官方語言的地位 (1922 年) 及 1948 年獨立建國之後，以色列逐漸的發展出能夠既能讀、又能說希伯來語

的「基本社會」(Berdichevskv, 2004)。⁷

這個階段是母語回歸家庭，達成語言的世代傳承。學校母語教育的作用是，水準的語言功能擴張，並無法達成語言的世代傳承，家庭母語傳授才能達成垂直的代代相傳，獲得永續生存的憑藉 (Fishman, 1991；張學謙，2011a)。缺乏家庭的世代傳承機制，學校的母語教育就無法達成母語流失，愛爾蘭的經驗就是如此。⁸ 許多語言復振，都以學校為主要的復振機構，不過未能成功，主要原因也就是在於無法影響到家庭和社區的語言使用。Fishman (1991) 正確的指出，任何階段的語言復振作為，如果未能和家庭、社區連結，對於母語傳承作用不大。因此，如同 Hinton (1999: 75) 所建議的：「如果學校是母語學習的場所，又要想達成語言復振的目的，那麼就得把母語帶出教室外，帶回家使之成為社區溝通的語言。」

肆、微觀語言規劃的角色

近年來，微觀語言規劃 (micro language planning) 逐漸受到語言規劃界的重視，特別是規劃者 (agency) 的議題 (Baldauf, 2008)。宏觀語言規劃 (macro language planning) 常以政府單位由下而上的政策，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規劃者通常就是政府官員，忽略了政府以外的語言規劃參與者及其相關活動。微觀語言規劃將語言規劃者擴充到國家之外的層級，不管是國家、教堂、學校或者家庭都可以作為語言選擇的決策單位，也都具備類似的決策過程 (Cooper, 1989: 37-38)。

希伯來語復振期間，為奧圖曼土耳其帝國所統治，並無相關的政府部門做宏觀語言規劃，當時也沒有組織，有足夠的力量，讓希伯來語重新成為日常用語；發生在家庭、社區的轉向希伯來語使用，似乎是未經規劃的

⁷ Benjamin Harshav (1993: 40) 把「基本社會」(a base society) 定義為「語言的社會存在」(the social existence of the language)，也就是說，這個語言在社會上有足夠多的人以之為基本的溝通及獲取資訊的工具，並運用於所有社會和機構的情境 (引自 Berdichevskv, 2004: 24)。

⁸ 關於愛爾蘭與希伯來語復振的比較請參考張學謙 (2011b)。

結果 (Nahir, 1998)。如果按照傳統語言規劃的看法，的確會將希伯來語復振運動排除在語言規劃之外，不過，如果拋開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規劃觀，從微觀語言規劃分析，或許能將希伯來語復振經驗，納入語言規劃中。這樣做才不會把希伯來語復振經驗，當做純然的歷史意外，導致無法從中汲取值得參考的語言規劃理論與實務。Nahir (1998) 是首位從微觀語言規劃分析希伯來語復振運動的學者。他認為希伯來語復振為口語，可以說是微觀語言規劃的一例。從微觀規劃的角度，希伯來語復振可以刻畫如下 (Nahir, 1998: 352)：

由許多細小、個別的、似乎微不足道的微觀語言規劃 (MLP) 活動匯集而成的，以語言復振為主要目標……由教師、校長、家長、地方領袖等人構成的「微觀語言規劃者 (MLP agents)，各自在其「語言規劃工作室」(MLP cells) 展開微觀語言活動。

希伯來語復振是集體努力的成果。在集體行動中，參與者的姓名通常不為人所知，不過，在希伯來語復振運動中，本-耶胡達倒是被認定是代表性人物，以下我們簡單介紹，他個人在家庭語言復振的作為，並檢討傳奇式解釋缺失。

本-耶胡達是為人所熟知的「希伯來語復興之父」。他於 1858 年出生於立陶宛，本名為 Eliezer Perlman，1881 年移居巴勒斯坦 (Abley, 2003)。他確信猶太人需要回到故土，並且說祖先的語言，因此，取了 Ben Yehuda 這個希伯來語名字。他的小孩於 1882 年在耶路撒冷出生，取名為 Ittamar Ben-Avi，本-耶胡達決心打造一個完全希伯來語的家庭環境，因此，不讓他跟其他的小孩子玩。據說，他的小孩子快出生的時候，他堅持要先給產婆上一堂希伯來語課，才允許產婆給他太太接生。本-耶胡達為了讓小孩子掌握希伯來語文法性別 (gender) 的觀念，家裡的貓跟狗，都分別飼養兩隻，一公、一母 (Abley, 2003)。本-耶胡達在希伯來語的其他作為，包括：(一) 1884 年與友人創辦第一份希伯來語報紙；(二) 1890 年創立希伯來語委員會；(三) 1904 年，編輯第一本現代希伯來語辭典 (饒本忠, 2009)。基於上述語言復振行動，早期的希伯來語復振研究，都把希伯來語復振歸功

於本·耶胡達的貢獻 (Nahir, 1998)。這樣的說法，有待商榷。後續的研究發現，本·耶胡達是近代在家僅以希伯來語養育小孩的第一人，不過將希伯來語帶到家庭的並不是他的影響。他到耶路撒冷 20 年後，只有十戶人家在家說希伯來語。學校推廣以希伯來語做為教學語言，才是促進家庭希伯來語使用的推手 (Cooper, 1989)。Nahir (1998: 335-36) 對個人英雄主義式的希伯來語復振以下的評論：

1. 語言復振不可能有一個人獨力完成；
2. 當時語言復振是一群農村學校教師群力合作的結果，本·耶胡達跟他們沒有什麼聯繫；
3. 1914 年在耶路撒冷只有百分之四的猶太人說希伯來語，這時候，在其他地區大概已經完成語言復振的工作。
4. 本-耶胡達創立的希伯來語委員會 1891-1904 年之間停止運作，在希伯來語復振的期間，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Fishman (1991: 323) 也批評本·耶胡達在時機未成熟時太過強調形式化、機構化的作為，在缺乏草根的力量，嘗試由上而下作為，是導致本-耶胡達失敗的原因。本-耶胡達及希伯來語委員會主要的貢獻在於語言本體規劃，而非語言地位規劃。希伯來語習得規劃主要的貢獻者是高度投入、意志堅定的許多教師團體，特別是在農墾區的學校教師 (Nahir, 1988)。除此之外，Nahir (1988) 還列舉了 1903 年成立的希伯來語教師協會⁹，以及當時新成立的勞工運動，這個運動為來自東歐的新移民提供成人希伯來語課程。希伯來語復振的最大功臣是學校，學校在希伯來語口語化過程中，和家庭、社區、移墾區緊密相關，也得到這些單位的全力支持 (Fishman, 1991)。

希伯來語能夠從學校走回家庭與社區成為日常用語，可以想見家長及兒童彼此也在微觀的家庭單位，作出支持希伯來語的家庭語言政策，類似本-耶胡達厲行在家說希伯來語的家庭應當不少。不過，由於缺乏相關的文

⁹ 其成立宗旨為：(a) 提升希伯來語教學，學校希伯來化；(b) 在學校復興希伯來語和猶太人的精神；(c) 改善教師的環境 (Azaryahu, 1929; 引自 Nahir, 1988: 290)。

獻，這些微觀層次的家庭和社區語言意識和語言行動的樣貌，無法在此呈現。家庭和社區人士透過什麼樣的機制（mechanisms）創造出有利希伯來語的語言實踐，值得進一步研究。¹⁰

伍、希伯來語復振對台灣的啟示

希伯來語復振成功，成為許多國家競相模仿的對象。在語言復振文獻上，也有不少是比較研究的文獻，其中最多的是希伯來語與愛爾蘭復振運動的比較，如 Berdichevskv (2004)、O'Laoire (1996)、Cooper (1989)。這應當是兩者開始復振的時間接近，都在十九世紀後期，又都以民族主義和獨立建國作為號召。其他和希伯來語比較的語言包括：毛利語 (Spolsky, 1996)、澳洲原住民語 (Zuckermann & Walsh, 2011)。本節整理相關文獻，列出希伯來語復振經驗，值得台灣語言復振參考的地方，如下：

1. 多語言的優勢：猶太人在長期流散過程中，習慣多語現象，沒有「單語心態」(monolingual mindset)，不排斥多語言使用 (Zuckermann & Walsh, 2011)。台灣語言復振運動，需要破除單語心態，強化「多語」是優勢和資源的觀念；
2. 文獻記錄多：希伯來語長期發展其書面語，文獻資料豐富，希伯來語顯示就算不在使用於口語場合，只要書面語存在，就具備復振的潛力。台灣瀕臨死亡的語言，應該加緊腳步進行語言記錄，為後續的語言復振保留足以復興的資源；
3. 聲望高：希伯來語是有聲望的語言，是以色列的官方語言之一，台灣除了華語外，都是鄉土語言，未享有官方地位，不利族語獎賞系統的確立以及族語語言權利的保障；
4. 單一性 (uniqueness)：希伯來語為猶太人的共同語，單一語言的復

¹⁰ Shohamy (2006) 以「機制」(mechanisms) 指稱作為語言意識形態及語言實踐仲介的顯性及隱形的方法或策略。語言政策可以透過不同機制創造出實際的政策 (de facto)，簡單的說，機制是用來影響，創造及促進語言政策的工具。

振，比復振多種瀕危語言來得簡單（Cooper, 1989）；

5. 強烈的族語意識形態：希伯來語復振與語言民族主義結合，有極強的語言意識形態支撐，台灣弱勢族群有淡化語言與認同關係的傾向，目前主要強化族語的工具性價值，如考試加分，應當加強教師與家長的族語意識形態，使之成為族語復振規劃的規劃與執行者；也需要培養而提供強化族語使用
6. 足夠的族語學習：希伯來語以浸淫式的方式，培養幼兒的語言能力，後續全以希伯來語作為學校教學語言；台灣的族語教育限於一週一堂課的學科，並非教學用語，學習時間不足，應考慮將族語作為教學語言，並提供幼兒完全族語的學前母語教育；
7. 走出校外的族語使用：希伯來語復振由兒童在學校學會族語，並從學校將族語帶回家，與家長共同學習和使用族語，培育出全講族語的新生代，完成族語世代傳承；台灣的族語教育需要突破僅為學校教導的語言的限制，走出校園，成為學校之外，家庭與社區的日常口語溝通工具，完成再本地話的任務；
8. 致力於世代間族語傳承：許多語言復振運動常淪為原地踏步的空轉，每一代在學校重新學習族語，卻沒有將族語傳給下一代；希伯來語復振成功的培養出以族語為第一語言的新一代，達成語言的世代傳承；
9. 自我賦權，非靠政府的力量：希伯來語復振之初，並無官方政策的支持，全是靠社區人士自我賦權；台灣語言復振目前雖然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在社區層次上，自發性的語言實踐，並不多見；
10. 家庭與社區的微觀語言政策規劃：官方語言政策很難滲透至家庭與社區，然而，這兩個場所，卻是族語傳承的關鍵，希伯來語復振有教師、家長與社區人士，齊力合作培養族語意識、建立族語學習和使用的環境；台灣在家庭與社區的族語環境營造以及意識形態的啓發，都需要進一步加強，要是缺乏家庭和社區的草根力量支持，族語復振很難成功。

陸、結論與建議

猶太人復振希伯來語的經驗顯示，就算是已經沒有說話者的語言，還是能夠再口語化，成爲日常生活用語，透過往下紮根，達成母語的世代傳承。這就回答了，語言復振是否可能的問題。就如同辛頓（Hinton, 2001）所指出的，語言復振雖然既困難又複雜，但是不管語言流失的程度爲何，只要有心，積極從事復振工作，積少成多，仍能達成設定的目標。

希伯來語復振經驗顯示，微觀語言規劃的重要性，透過學校、家庭和社區在地方層次的語言復振作爲，無需官方介入，就能夠將沉睡的語言喚醒。從語言習得的角度，這個過程大致是：在學校刻意的族語學習（*artificial learning*），學習後，將母語擴散到校外，慢慢的影響到家庭與社區，族語爲第二語言者成家後，以自然學習的方式（*natural learning*），培養出族語爲母語世代，達成語言復振。

希伯來語復振可說是重建崩塌的巴別塔。在現代強調語言文化多樣性的社會。猶太人藉以復振希伯來語的語言民族主義，或許應該從語言保存的觀點，轉化爲建立各族群的語言巴別塔，而非單一巴別塔。

《聖經·使徒行傳》第二章五旬節的故事，提供我們超越巴別塔，想像多語言並存的可能性。那時候，來自世界各國的猶太人住在耶路撒冷，突然間聖靈灌注在門徒身上，能說出別種語言。巴別塔造成彼此無法溝通的現象已經不見，而呈現多元語言使用，也就是說成爲多種語言的使用者。巴別塔和五旬節這兩個與語言相關的故事，被 Laponce（2006）拿來作爲七大語言法則的前兩項。他提出的「巴別塔效應」（*Babel effect*）是指母語以地區單語的方式，在族群聚集地區可以安全無虞；「五旬節效應」（*Pentecost effect*）指的是，弱勢族群學會強勢語言，成爲雙語人，合作型的「五旬節效應」能讓母語和第二語言並存；而競爭型的「五旬節效應」將導致學習第二語言、失去母語的結果（張學謙，2008）。

希伯來語復振雖然成功，卻也有值得反省的部份。希伯來語復振過分的追求單一語言的復振，卻犧牲其他猶太民族的語言，如阿拉伯語及超過

40種的猶太移民語言，代價還包括把過去的多語現象的價值轉變成單語意識形態。Elana Shohamy (2008) 質疑這樣做法的妥當性，她的調查顯示希伯來語規劃者，透過各種機制進行語言控制，將希伯來語作為所有領域的唯一語言；透過削減式的意識型態 (subtractive ideology)，希伯來語的推行，以犧牲其他語言為代價；其他語言被視為是競爭者、入侵者、威脅、干擾、敵人，因此需要加以壓制。

語言民族主義強調的單語同化意識，常常危及語言多樣性的存在。語言的推廣，並不一定會造成語言流失，要不然就不會有雙語現象。語言復振規劃應當放棄「非此即彼」的排除性語言政策，追求添加式的語言政策 (additive policy)，確保族群語言的權利。在語言政策上，可以採取建立族群語言地盤的方式保存族語，即在族群群聚的地方，建立族語的巴別塔；語言與語言之間，採取合作型「五旬節效應」，讓母語和第二語言能夠並存。Laponce (2006) 以比利時、魁北克和瑞士為合作型雙語現象的典範。這些地區的弱勢語言，各自集中在自己的地盤，「巴別塔效應」和「五旬節效應」取得平衡 (張學謙, 2008)。從微觀語言規劃可知，人人都可以是語言復振規劃者，特別是在家庭與社區，這些政府政策無法直通的地方，但是最能夠確保母語世代傳承的地方。

參考書目

- Baker, Colin (翁燕珩譯), 2008。《雙語與雙語教育概論》(*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希歐多爾·赫茨爾。1993。《猶太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 林書武, 2001。〈希伯來語成爲以色列民族通用語的原因〉《外語研究》1期, 頁31-38。
- 張學謙, 2008。〈國家能否挽救弱勢語言? 愛爾蘭語言復振爲例〉《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4卷, 4期, 頁21-47。
- 張學謙, 2011a。《語言復振的理論與實務: 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 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 張學謙, 2011b。〈從學校語言到生活語言: 邁向原住民族語復振〉《台灣原住民研究學報》1卷, 3期, 頁157-82。
- 鐘志清, 2010。〈希伯來語復興與猶太民族國家建立〉《歷史研究》2期, 頁116-26。
- 饒本忠, 2009。〈希伯來語的復活——語言學史上的奇跡〉《時代文學》3期, 頁114。
- Abley, Mark. 2003. *Spoken Here: Travels among Threatened Languages*. London: Heinemann.
- Bachi, Roberto. 1956.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vival of Hebrew in Israel." *Scripta Hierosolymitana*, No. 2, pp. 179-247.
- Baldauf Jr., Richard B. 2008. "Rearticulating the Case for Micro Language Planning in a Language Ecology Context," in Anthony J. Liddicoat, and Richard B. Baldauf, Jr. eds.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in Local Contexts*, pp. 18-41.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Berdichevskv, Norman. 2004. *Nations, Language and Citizenship*.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
- Cooper, Robert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mmins, James. 1979. "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Childre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No. 49, pp. 222-51.
- Fishman, Joshua A. 1972.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wo Integrative Essays*.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Glinert, Lewis H. 1987. "Hebrew-Yiddish Diglossia: Type and Stereotype, Implications of the Language of Ganzfried's *Kitzu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No. 67, pp. 39-55.

- Harshav, Benjamin. 1993. *Language in Time of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inton, Leanne. 1999. "Teaching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Bernard Spolsky, ed.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pp. 74-77.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 Hinton, Leanne. 2001.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 Overview," in Leanne Hinton, and Kenneth Hale eds.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pp. 3-18.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Laponce, Jean. A. 2006. *Loi de Babel et autres régularités des rapports entre langue et politique*. Québec: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 Nahir, Moshe. 1983. "Sociocultural Factors in the Revival of Hebrew."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Vol. 7, No. 3, pp. 263-84.
- Nahir, Moshe. 1988.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Great Leap' in the Hebrew Revival," in Christina Bratt Paulston,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pp. 275-95.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Nahir, Moshe. 1998. "Micro Language Planning and the Revival of Hebrew: A Schematic Framework." *Language in Society*. No. 27, pp. 335-57.
- Nettle, Daneil, and Suzanne Romaine. 2000.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Laoire, Muiris. 1996. "Hebrew and Irish: Language Revival Revisited," in Tina Hickey, and Jenny Williams, ed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63-72.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Paulston, Christina Bratt; Chee Chen Pow, and Mary C. Connerty. 1993. "Language Regensis: A Conceptual Overview of Language Revival, Revitalisation and Revers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4, pp. 275-86.
- Rabin, Chaim. 1973.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Language*. Jerusalem: Jewish Agency.
- Saulson, Scott B., ed. 1978. *Institutionalized Language Planning: Documents and Analysis of the Revival of Hebrew*. The Hague: Mouton.
- Shohamy, Elana. 2006.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Abingdon: Routledge.
- Shohamy, Elana. 2008. "At What Cost? Methods of Language Revival and Protection," in Kendall A. King, Natalia Schilling-Estes, Lyn Fogle, Jia Jackie Lou, and Barbara

- Soukup eds. *Sustaining Linguistic Diversity*, pp. 205-18.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Spolsky, Bernard. 1989. *Condi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troduction to a Gener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olsky, Bernard. 1991. "Hebrew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within a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Robert L. Cooper, and Bernard Spolsky eds.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Culture and Thought: Essays in Honor of the 65th Birthday of Joshua A. Fishman*, pp. 137-55. Berlin: Mouton.
- Spolsky, Bernard, and Elana Shohamy. 1999. *The Languages of Israel: Policy, Ideology and Practic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Spolsky, Bernard, and Elana Shohamy. 2000. "Hebrew after a Century of RLS Efforts," in Joshua A. Fishman ed. *Can Threatened Languages be Saved?* pp. 349-62.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Spolsky, Bernard. 1996. "Conditions for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Cases of Hebrew and Maori," in Sue Wright, ed. *Language and the State: Revitalization and Revival in Israel and Eire*, pp. 5-50.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Spolsky, Bernard.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uckermann, Ghil'ad, and Michael Walsh. 2011. "Stop, Revive, Survive: Lessons from the Hebrew Revival Applicable to the Reclamation, Maintenance and Empowerment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 31, No. 1, pp. 111-27.

How to Awaken a Sleeping Language? The Experience of the Hebrew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Tiuⁿ Hak-khiam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aitung, Taiwan

Abstract

Hebrew has been a sleeping language for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however, between the late 19 century and the early 20 century, it was awakened to become a vernacular language. The success story of Hebrew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s the most cited example in the literature. It is often described as “miraculous” rebirth from language death, or the only example of language revival. Using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micro language plann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and sociolinguistic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 of Hebrew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Hebrew’s experience not only show that endangered language can be saved, but also provide ways to awaken sleeping languages. Implications for Taiwan’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re provided.

Keywords: Hebrew,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nationalism, micro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acquisition